

高 教 动 态

总第 15 期 2010 年第 4 期

嘉兴学院发展规划处 主办

2010 年 12 月 20 日

本 期 要 目

★年终盘点★

2010 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 1

★前沿理论★

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 14

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 19

大学“去行政化”难在哪里？ 26

★一流大学★

想念洪堡——柏林大学创立 200 周年纪念 34

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确立：理性的凯旋 39

洪堡 2010，何去何从 44

★年终盘点★

2010 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不仅仅是一纸规划

事件回放：

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于 2010 年公布，这是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作为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研究制定于 2008 年 8 月启动，2010 年 3 月 1 日，《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历时一个月。

2010 年 7 月 29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教育规划纲要》，其由序言、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保障措施和实施组成，共 22 章、70 条，约 27000 字。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今后 10 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我国将开展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

据统计，在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有 21 处“逐步”。正式文本中“逐步”减少为 18 处。其中，比较关键的减少为，将征求意见稿中的“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修订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据分析，这里少了一个“逐步”，无疑体现了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坚定决心。

点评：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总结了《教育规划纲要》的四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目标非常明确，开宗明义讲要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纲要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二个亮点是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高等学校。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第三个亮点是各级各类教育都把提高质量作为

重点，作为改革发展的核心。第四个亮点是整个教育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到 2020 年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这对来说是很大的提高。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教育规划纲要》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迅速、巨大变化中的国家。但国家这么重视，至少在规划制订过程中了解了公众对教育的期望和一些特别希望解决的问题，纲要中多少有所涉及。有了措施，对教育绝对是个推动。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而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目前《教育规划纲要》所设定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目标、举措能否真正落实。对于已经确定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主导者、途径与手段，加快推动其实施的进程，显得至关重要。

高校结盟自主招生：减负？加码？

事件回放：

2011 年高校自主招生引起广泛关注：短短数天，“清华系”7 校、“北大系”13 校、“理工系”8 校，近 30 所中国顶尖大学上演了一场“结盟”大戏，呈“三国鼎立”态势。

2010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大学 7 所综合性知名大学宣布，在 2011 年实行联合自主招生。随后，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 6 所综合性大学决定，参加 2011 年中国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工作。13 所综合性大学也同时发布了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时间，定为 2011 年 2 月 20 日。

2010 年 11 月 25 日，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8 所高校宣布，将在 2011 年的自主选拔录取中实行联考，将联合命题、统一组织笔试并共享考试成绩。

2010 年 11 月 26 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7 校确定了 2011 年自主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 2 月 19 日。

2010 年 11 月，北大 11 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公开信，建议进一步加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或许具有突破性意义。

点评：

有评论指出，三大阵营联考确实可以减少考生“赶场”的次数，但另一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个联考同盟内的成员越多，联考规模越大，对考生而言，这一考试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为之付出的精力自然也会越多。而最让人担心的是，所谓自主招生联考，不过只是应试教育的加码。

高考研究专家王极盛认为，相对于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模式，以联考为模式的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一种进步。至于选择，首先家长要了解孩子，不要什么机会都不放过，要根据孩子的志向、兴趣、抱负、特长，包括家里的情况综合考虑去选择。

似乎每项有关高考改革的措施出台或提出后，都会承受好评与质疑的煎熬。有评论指出，能否建立灵活、多元的招生制度，不仅关系到人才选拔，而且对基础教育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一片质疑声中也能听到另一种呼吁：应当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更大的空间，使更多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作为一项招生新政，高校自主招生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一味地求全责备，不如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使其“走两步”看一看，看看这条道能否走得远，走得通。

“卓越计划”启动：造就卓越工程师

事件回放：

“拥有最好工程人才的国家占据着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美国工程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如是说。

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 1003 所，占本科高校总数的 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 371 万人，研究生 47 万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教育大国。如何能够让中国的工程师“卓越”起来，已成为工程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0 年 6 月 23 日，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卓越计划”实施的专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将适度超前培养人才；实施的层次包括工科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培养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

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的工程师后备人才；实施期限为 2010 年—2020 年，参与计划的全日制工科本科生要达到 10% 的比例，全日制工科研究生要达到 50% 的比例。

点评：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要使今天的大学生成为将来的“卓越工程师”，必须打牢综合素质基础。

龚克认为，所谓“卓越”就是素质高，要在素质教育的框架中结合工程人才的特殊要求来确定“培养要求”；其次，必须形成开放的培养体系，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最后，必须突破评价瓶颈。

教育部副部长陈希指出，产学研结合是工程教育的本质要求，高校要从学校的内部培养走向开放的校企合作培养。

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心目中的“卓越计划”有一个关键词——实践。“实践不仅能能使学生增长经验、把学到的知识与社会需求对接，而且能够触动学生心灵，使其产生开拓创新的激情。经过实践历练的学生拥有的是活的能力，而非死的知识，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坦言：“工程教育普遍缺乏创新性和实践性，一直是困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多年的难题。”

左铁镛表示，过去，我们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深受苏联、美国以及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影响，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主动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讲，实施“卓越计划”，不仅是工程教育的事，更是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需要，需要科技界、教育界和企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求答“钱问”

事件回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0 年 10 月 30 日，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

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试解“钱学森之问”。

李政道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主旨演讲，从办学模式、教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探讨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经历讲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他认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还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优秀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给了他很多启迪。“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博士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谈及自己的创新思维，李政道认为与自己在浙大和西南联大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虽然抗战时期国内的教育环境很艰苦，但我们国家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已经成为大学的必然使命。2010年围绕“创新”的讨论不断，继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后，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也以“大学创新”为主题，探讨了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对于李政道提出的“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大学精神的缺失。

秦伯益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大获最大单笔捐款：期待教育捐赠常态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一笔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约合人民币2亿多元。这是中国高校接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这笔捐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著名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

据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这是段永平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此外，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资料显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广东创业，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2001年，段永平赴美开始投资生涯，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夫人刘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点评：

段永平巨额捐款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有人将其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的张磊比较。同为中国大学毕业生，一者向国内大学捐款，一者向美国名校捐款，两个人互为参照，引发网友热评。

段永平坦言，作为一个捐款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多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把钱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别的学校”等等。有过多次捐资经历的段永平还表示，国内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分”，但慈善机制却不健全。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配套措施的跟进，师资、教室、学生宿舍、教学设备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有效的捐赠机制可以使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共

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物质资源，更促进并形成了高校特有的文化传承。创造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是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其他经费四大类。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目前高校经费中来自捐赠的还不多。

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占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常青藤院校高达 25% ~ 45%。而我国大学社会捐赠规模不到美国的 1%，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美两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国对于社会教育捐赠的运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建立起有效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开展大学社会捐赠的积极性，让社会教育捐赠常态化。

抄袭风波再起：孰是孰非，“反腐”机制何在？

事件回放：

2010 年 3 月 10 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 20 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 5 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2010 年 7 月 7 日，63 位国内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公布调查结论及各委员的投票意向。

两天后，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称

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汪晖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4月，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作为学者，他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时，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最终结论要靠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直到目前，尚无“学术共同体”来最终鉴定王彬彬的指责是否确有其事。

2010年7月11日，一篇名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的报道让朱学勤进入大家的视野。此前，《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等系列文章早已见诸网上，称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

朱学勤198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

2010年7月13日，朱学勤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动提交了调查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已经受理，上海大学校方则同意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尚未公布审查结论。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王彬彬已公开撰文批评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现象，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应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听证，以鉴定汪晖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熊丙奇也关注了“朱学勤事件”。他表示，不论对于汪晖还是朱学勤，他们是否涉嫌抄袭，自己并没有专业能力判断，但是解决学术争端的基本制度应该是一致的。

最近涉嫌抄袭、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

熊丙奇开的药方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自治，摆脱行政的影响，学者贡献不由官方认定，不由媒体认定，而是遵从学术共同体认定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不看所谓的影响和江湖地位。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峰表示，抄袭成为学术界的病症，不能因为学术体制的弊端为抄袭辩护，有些学者遗忘了对社会的责任，谋求体制下的利益，而“学术良知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立足点，学者应该安贫乐道，良知不改”。

钱伟长逝世：“化作春泥更护花”

事件回放：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我国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 6 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 98 岁。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3 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 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2005 年 7 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 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点评：

“钱伟长校长的去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北京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家兼教育家吴树青在得知钱伟长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非常震惊，同时流露出了惋惜之情，他说：“我与钱校长在学术上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不好评价。但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在世界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树青说：“在为人方面，我认为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楷模。”

“去年钱学森先生走了，昨天钱伟长先生又走了，想起来心里就难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哽咽了，他停了停却依然无法继续，眼泪夺眶而出。

在梁思礼看来，人们对于钱伟长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赫赫功绩，更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三钱”为中国人民留下一座精神宝库。“钱三强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我国力学之父，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梁思礼说，“他们爱国报国，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治学严谨，甘于奉献……为我们留下一座精神宝库，所有中国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我们应该向‘三钱’学习，学习他们的人格、学风，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几年，一个个大师相继驾鹤西去，以至我们常哀叹于这个时代大师的匮乏。

何谓大师？大师之大，不仅在学问之高，还在于人格之尚。钱学森“姓钱但不爱钱”；钱伟长下放劳动时，仍推导了 12000 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丁聪一生甘为“小丁”，画展从来不要花篮和开幕式……“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这正是大师们自身的写照。

大师在哪？当下的象牙塔或许真陷入“大学真穷，大师真少，大学真危险”的窘境，但我们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在没有权术与功利的地方，一定会有大师在静默生长。

大师装不来、等不来、骂不来，不妨以宽容与期待，在寻求变革中呼唤未来大师的横空出世，这也是对前辈大师最好的怀念。

“根叔们”的出现：以学生为本情怀的回归

事件回放：

2010 年夏天，“根叔现象”火了。

2010 年 6 月 23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 2010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 16 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 30 次。全场 7700 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李培根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

“我此时的心情，或许你们经常传唱的一句歌词更能够表达：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

白……”201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借用周杰伦的歌曲《千里之外》送别3118名本科毕业生。演讲中，周其凤引用了诸如“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隐形的翅膀”、“杜拉拉”等流行字眼。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毕业典礼上提到，意大利、法国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在小组赛早早被淘汰，无论名声、传统、天赋还是金钱，都无法让他们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忘记了对球队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点评：

有人指出，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

“我总体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

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作上述表示。他认为，“根叔现象”的出现是高等院校改变“党八股”的一个体现。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作者李清川认为：“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根叔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李培根校长等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内容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其实是因为其中蕴涵着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和情怀的回归。

“从受欢迎程度和学生态度看，现在的毕业典礼还做得远远不够。”王旭明说，这几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刮起了一阵大白话旋风，“这本是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但现在却受到重视和吹捧，将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变成不同寻常，至少说明在校长演讲的话语体系中，确实存在着官话套话。”

王旭明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大学校长能在演讲时不仅仅使用网络语言，更要说大学生爱听的实

话，以及他们走向社会之后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可以结合不同大学的传统和精神，结合学生的特点，对未来提出寄语，这样除了生动活泼之外，更会有一层深刻和永恒的意义，使演讲中不仅有热闹，而且有魂。

南方科大获准筹建：“去行政化”有多难？

事件回放：

致力于建成中国第一所“教授治学”高校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三年半，2010 年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但是还没有正式下发文件。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获批复筹建对南方科大意义重大，将推动南方科大的教师招聘、学生招录等一系列工作。朱清时坦陈，虽然南方科大被海内外知名学者寄予厚望，但是由于没有被教育部正式批复，有很多学者仍然在观望。

2007 年 3 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香港科技大学，建设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打算革新高校体制，建立“去行政化”、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南方科大的这一探索，被中国教育改革者寄予厚望。2010 年 9 月 30 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正式开工，预计首期工程 2012 年竣工。同日，55 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据报道，南方科技大学（筹）教职和行政人员薪酬体系方案已经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根据方案，领军教授的年薪将从 115 万元起步，向香港知名大学看齐。

目前该校课程设置、教室安排都已准备就绪，一旦获批马上就能招生。“虽然教育部还未批准我们招生，但是拿‘准生证’基本没有悬念。”朱清时介绍，学校目前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包括课程设置、教室安排等。学校仍在积极申请争取近期招生，教育部一批准，就立刻开始招生程序。

点评：

一所备受瞩目的大学筹办 3 年还拿不到“准生证”，究竟卡在哪儿？有评论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可“自主”到什么程度，却是需要分寸拿捏的。现在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习惯”校长用一台电脑也要向深圳市政府报批的惯性；二是要向主管部门公关，想尽早拿掉“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想脱离行政化，却首先要仰仗于行政化的审批；

立志于“去行政化”，却困于行政化的门槛。因为行政化的体制障碍而迟迟拿不到准生证，行政化给南方科大的“下马威”，让公众看到了教育“去行政化”是多么的艰难。

也有评论指出，在我们急切等待南方科大成立时，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关注南方科大的每一步办学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要求，当下的问题是，深圳和南方科大应将《大学章程》制订出来——这可让大家看到南方科大将建立怎样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体系。如果南方科大《大学章程》出台，而教育部门仍不批准其设立，这就是行政化以及表面改革但实质并不愿改革的问题了。

南方科大要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典范，制订《大学章程》是十分重要的起步。有学者表示，作为一所带有明显改革意图的大学，还要面临很多的未知数。比如，深圳领导换届、改变办南方科大的意图怎么办？朱清时不当校长之后怎么办？为避免这些未知数给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人才招聘、校长遴选等带来麻烦，应事先对所有问题进行预估，建立保障大学财务独立性、办学自立性的基本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没有建好就仓促上马，会给未来的办学带来很大的风险。

清华学堂起火：一把火的反思

事件回放：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句名言曾被无数次引用。

2010年11月13日，清华大学因大楼而“火”了一把。当日凌晨，正在修缮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早期标志性建筑清华学堂失火。44部消防车、308名消防官兵耗时两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大楼东部部分屋顶被烧塌，过火面积达800平方米，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发生火灾的是清华学堂东南角的一部分，清华学堂的主体结构和主要立面未受影响，主要入口也完好无损。此次火灾中，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一期工程幸免于难，过火部分属于清华学堂二期建筑。

据北京市文物局初步评估，火灾对清华学堂的木结构造成了严重损毁，是北京文物古迹 10 余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灾害。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承认，清华学堂加固工程还未获批就发生了火灾。对于施工单位没有文物修缮资质的质疑，顾秉林表示，这是加固工程，施工单位有加固资质。

顾秉林还表示，清华学堂修缮工程何时复工，须等相关单位通知。复工后学校会加强管理，修缮工程工期应该不会受影响。

点评：

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矗立着一座式样别致的二层楼房。此楼为德国古典风格，青砖红瓦，坡顶陡起，这就是“清华第一楼”——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作为早期清华的象征，始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历史魅力，留在了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心中。

“真有些不相信，百年的老学堂，清华大学的象征建筑，怎么会起火呢？”火灾发生后，不少学生立马赶来，想亲眼求证。

一位老教师无比惋惜：“这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教室，是清华精神的源起。每个清华人，无论老少，有哪个不对这个地方有着或深或浅的感情。”

一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博客里写道：“清华学堂那稀稀拉拉的绘图课桌，那吱吱呀呀的楼梯地板，那若隐若现的古旧霉味，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和青春的记忆。而如今一把大火烧毁了清华学堂的建筑，烧得真心痛。”

2011 年 4 月，清华大学将迎来 100 周年校庆。伴着清华园一同诞生的清华学堂，是记录历史和寄托“大师”精神的所在，更是清华作为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她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其实际功用。建筑终归是死的，如果没有灵魂，任何躯体都是空壳。

于是，对大学古建筑的保护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保护大学精神的寄托。

我们总是听说，某某建筑见证了何种辉煌、经历了多少沧桑、承载过多少光荣与梦想，这一系列的词句用的都是“过去时”。对过往辉煌的过度追忆，反而映衬了当下精神与现实的苍白。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和珍视传统的民族，当历史的遗迹不能得到很好保护时，人们难

免会对今人继承优秀历史传统、发扬大学精神的能力产生怀疑。

一场火灾，使“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遭遇网友狂喷。网友的发泄可能不理性，但何尝不是人们恨铁不成钢？

这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在清华园发生，还是让人看到清华作风浮躁的印痕。因为就在火灾发生的几天前，清华刚刚在清华学堂旁边举行了消防演习，不想几天后，这个曾经会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的地方，就成了火灾的现场。

清华学堂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能否让攀比成风、急功近利的中国高校从急躁冒进中“激流勇退”？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科学时报

★前沿理论★

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

自去年以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大学“去行政化”成为媒体报道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不少委员、代表纷纷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由于理解不一、观点各异，使得大学“去行政化”问题进一步升温。总体看来，多数人对所谓大学“行政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行政化”导致大学背离了存在的本质，已成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大学办学质量的障碍，主张“去行政化”。也有人对大学“去行政化”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在当前“去行政化”和取消行政级别有可能贬低大学地位，将会制约大学的发展。笔者认为，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深入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去”起来也就可能无的放矢，甚至于自乱阵脚，反而会影响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一、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行政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早期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出现而产生的古老的管理活动。严格意义上讲，行政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我国对行政管理的理解比较宽泛，除政府机构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活动。因此，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大学行政管理：国家行政机构对大学的管理行为；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对大学施行的管理。

应该说，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应用的初衷，在于提高大学管理的效率，确保大学有效实现其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学行政管理本质上只是一种实现大学组织目标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应该与当前广遭社会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区分开来。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根据以上对大学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从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大学的内部管理这两个层面来剖析大学“行政化”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

首先，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管理职能上，存在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等现象。大学作为独立法人和办学主体应依法享有的人事、财务、学术、规

划等方面自主权，未能全面落实。同时，政府在制定标准、监督评价等方面应承担的职责亦未充分履行。二是在管理方式上，政府有关部门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手段管理大学，较少应用财政、法律等管理手段，规范性和法制性较差，随意性较大。三是在管理作风上，存在简单化现象，特别是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存在官僚作风，讲究等级，与大学文化发生冲突。四是在管理文化上，大学倾向于依附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获取行政配置的资源，缺少对办学规律的深入研究，难以彰显办学特色。

其次，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比较普遍。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过多，忽视学者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大学中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或者泛化为行政组织，行使某种行政职能；或者作为“虚位”组织，学术权力在大学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往往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学术权力的弱化影响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降低了决策实施的严肃性，大学管理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未果”的现象。此外，由于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资源分配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学术事务被间接行政化，因此出现了个别学者热衷于到机关部处和院系所做官，部分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忙着读博士的现象。二是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不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越位。一方面，行政权力常常替代学术权力，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甚至于包办学术事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学术权力使用不当，学者在学术事务中观点偏颇、意见不一致，或在非学术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意志过于强烈等现象，对行政权力的行使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学术权力的主体，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不突出。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细则的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难以体现。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术委员会主要发挥咨询审议的功能，且议事规则不规范，相关决议的效力不明。

二、大学“行政化”产生的原因

应该看到，我国大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现象有其深层次的产生原因：既有大学内部的原因，又有大学外部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只有正确认识和分析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原因，才可能提出破解大学“行政化”难题的策略和措施。

大学内部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对垒，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一般而言，大学内部事务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与此相对应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行政权力扎根于权力授予，来自组织的委派或任命，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指示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强制性，其价值定位是保障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保证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及学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它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大学的内在要求，是大学本质特性的外化，主要依靠学者基于学术构建的权威对客体产生影响，具有松散性、非强制性、自下而上等特点其价值追求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得以保障。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协调匹配、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一所大学组建后，行政权力便相应产生。随着大学职能日益多样化，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增强，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加剧，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中不断强化。而学术权力的产生和培育相对缓慢，其权威性的树立需要较长时间，其有效履行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均明显弱于行政权力，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压制，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大学内部管理容易产生“行政化”现象。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对大学的管理以行政权力为主，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收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大学内部管理基本上也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权力决定资源配置、人事安排、绩效评定等，学术权力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从而严重制约了大学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深入推进，这种状况已有明显改善。尽管如此，由于体制的惯性，前述种种大学“行政化”现象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政府有关部门往往还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大学往往还习惯于依据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按照行政组织的管理方式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

系在不少方面还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在无形中又成为了大学内部行政机关和学术组织之间关系的范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大学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仍是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的延续。

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方针；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尤其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以及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改变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办学无法可依、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指导工作的状况。尽管有关法律法规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是明确的，但还缺乏实施办法和细则。高校到底应该享有哪些办学自主权、如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关键问题仍未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高校享有办学自主权，但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政府干预高校办学的现象。例如，与高校自主办学直接相关的预算、人事、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权力，有待进一步落实和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分配到大学内部的资源仍然通过行政机关进行二次分配；政府对大学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等。这些因素使得大学“行政化”和“泛行政化”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愈加凸显。

此外，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突出，导致一些大学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术人员对行政权力“情有独钟”，学校内部行政机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薄弱；社会往往也根据行政级别、行政权力等因素去判断大学从业人员的价值，使得大家将过多的精力去关注行政权力，这也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三、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及相关措施

在厘清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产生大学“行政化”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之上，即可“对症下药”，提出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和相关措施。无疑，既然产生“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去行政化”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取消大学行政管理或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关键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架构，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

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二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三要强化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相关制度，保障学术人员能充分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切实享有对学术事务的主导权；四要充分保障大学教师和学生权益，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教代会的职责并确定学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会的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学生群体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五要改善大学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尽快实现大学行政管理从官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总之，就是要推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能够真正以教师、学生和学术为中心，主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做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匹配、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大学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这不仅仅是权力，更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另一方面，大学的权力，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授权，政府有责任也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控，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职能。处理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必须正确定位政府的职能。政府是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宏观管理者和调控者，其目标在于促进大学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实施分类指导，不应直接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尤其不应直接干预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不应过多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应更多地采用财政、法律等宏观调控手段。具体而言，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应从直接的人财物控制转变到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从直接干预办学行为转变到通过制定办学标准、经济杠杆调节、监督检查和信息服务等手段对大学进行导向和调控。在制定相关政策、研制质量标准、实施建设项目建设时，应遵循大学发展规律，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要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名义上已作备案管理，实质上仍在行使审批权的事务；要尝试把学科评审和教学评估等工作委托给行业协会或其他中介机构。理想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应既能依法保障大学的自主权，同时又能有效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大学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依法办学。

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大学“去行政化”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其重要原因在于大学管理效能较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满足不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去行政化”（包括淡化乃至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等于在大学

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目标。20世纪末以来，加强管理、增强绩效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发达国家加强高校管理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科学化。在大学管理中引入各种先进高效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提高管理水平。二是专业化。世界知名大学都在全国或全球聘用专业管理人员承担管理岗位，并建立严格的聘用标准和聘用程序。三是重视能力提升。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项目，提高管理人员的相关能力。四是强调管理的文化内涵。倡导尊重学术，服务学生，服务社会。近年来，我国大学规模渐趋庞大，功能目标不断拓展，组织结构更趋复杂，大学除了学术事务之外，后勤保障、基本建设、学生管理、安全稳定等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这对大学管理的科学性及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权力过多集中在学校一级，管理重心偏高且效益较低；行政机构臃肿，职责不够清晰且应变能力较差；二级院系设置过多，学术管理跨度较大且效能不高；管理理念和方法陈旧，适应不了复杂多变的形势等。针对这些问题，大学迫切需要以管理重心下移为重点，建立结构合理、责权分明、运转高效的科学管理体系，并结合大学内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职员制的探索，建设一支整体素质优良的高效的职业化行政管理队伍，切实改善大学的管理效能。

应该看到，“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根深蒂固，大学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现象是“官本位”意识在大学的集中反映，其根本原因在于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建立。大学“去行政化”涉及到大学外部管理与内部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变革，涉及到政府、大学和大学从业人员的共同责任。令人高兴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此也予以了回应。

中国高等教育 2010年第9期

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 宣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以政府的名义表达了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积极态度。虽然在《纲要》中看到了“去行政化”与落实大学自主权的文字，但文本的明晰与近三十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并不足以打消社会的疑虑。据笔者的观

察，学者的立场主要从学理上依据大学的逻辑与理念批判了大学行政化的种种积弊，呼吁大学组织学术性的彰显与学术权力的回归；大学校长们更多的是从实际办学的操作层面上思考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公众则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待大多反映在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上，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大学行政级别的设定上。可以肯定的是，在认定我国大学行政化这一基本事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谁也不赞成大学的行政化，只是在对大学行政化的内涵、成因、表现、后果以及去行政化的时间表、路径与方法上表达出了不同的立场而已。

目前的情形在于单纯地指责大学对于行政化的热衷与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都难以服众并立竿见影地取得成效，去行政化会让大学有重新边缘化的危险，而行政化的继续蔓延会让大学失去创新的活力，何去何从，大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那么，如何改善大学的现状，让大学“独善其身”、“超凡脱俗”呢？笔者认为，走外儒内道之路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现实策略。

一、行政化的大学与大学的行政

（一）大学行政的价值与对行政化的批判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笔者曾在 2001 年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来描述和批判大学行政化的现象：在我国，大学的科层化、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学的学术性在许多层次上被行政性所代替，造成了大学校园内“学术本位”与“官本位”的价值冲突“学术意志”与“行政意志”的权力冲突；“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的利益冲突。行政权力的泛化使得大学校园活动主体的本末倒置，学术活动受制于行政权力，“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取代了“学术价值”这一校园的核心价值。更多的校园人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学术，追求的是“官位”而不是“学术真理”，而一定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诱惑使得部分学者放弃了对清贫寂寞的学术道路的追求。作为保障大学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系统游离于学术价值之外……学校行政系统积极性的高涨，对基层的学术工作是一种灾难而不是福音。

近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依然如故，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可否认，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是大学前进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车轮，大学组织是一个“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对大学行政化批判的同时，切不可一起倒掉“洗澡的小孩”，否认大学行政的作用。大学中的行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有其自身的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规范、组织互动、组织控制等，但并不是从大学的诞生开始，它就需要一个强有力而庞大的行政系统来支持的，中世纪大学产生时，大学内部的活动简单，其事务也主要由教师和学生处理，还没有分离出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来。随着大学走出“象牙之塔”日益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本身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地与社会方方面面进行物质、信息的交换，大学内部行政事务变得繁多

而复杂，客观上要求学校有一套行政系统来处理大学的日常事务。外界也日益认识到大学的作用，要求与大学进行合作，大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以满足与外界互动的需要成为必然。同时，由于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也越来越多，政府建立庞大的教育行政机构并赋予它各种职能和权力，教育行政机构行使其职能和权力时，常常要求大学内部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其衔接，贯彻教育行政机构的指令、指导等，这种情况强化了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从全球来看，到了 20 世纪，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大学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入学人数爆炸”的现象“。数量增长的进一步后果是学术官僚机构的发展”。毫无疑问，学术系统本身需要有更多的行政权力的介入，行政系统在大学的作用被强化了。

历史的实践证明，学术权力本身由于其权力主体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常常带有保守性“，行会式的学术权力模式，偏执和保守，排斥改革，在 18 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校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在大学的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学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大学的事务完全依靠学术权力来处理已不可能“，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来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由教授决定”。

（二）大学去行政化去什么

笔者无意否认，大学行政对现代大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也完全同意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在大学中矩阵组织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的判断，特别是在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今天，现代大学的运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支持和保障。但是任何权力都有局限性，权力的无度和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导致失误和混乱。行政化的大学其表现恰恰在于：一是政府将大学作为其延伸的部门不加区别地对办学进行直接管理与干预，在职能与机构的设置上要求与政府职能部门一一对应；二是在大学的内部管理上，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得不到彰显，使得大学组织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行政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而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使命，大学组织的核心价值是学术至上，在行为方式上遵循的是事物的“规律”，崇尚的是“平等、自由”，信奉的是真理，追求的是学问，在思维方式上张扬的是“求异”。而行政机构是以“官本位”为核心价值建立起来的科层体系，在行为方式上遵循的是“规则”，崇尚的是“约束、效率”，信奉的是“权力”，追求的是社会的“地位”，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求同”。显而易见，大学行政化的结果是大学偏离了作为学术机构的价值，在组织特性上异化为政府的特性，导致了大学创造力的丧失。而行政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则对大学的制度、文化、传统、

风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形成了大学决策活动中的制度和思维惯性，而且形成了校园人行为和处事中的“路径依赖”。

大学行政化的本质与关键不在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也不在于大学的科层结构，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组织理论都不会否定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与层次等级，等级与职能是组织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发展即横向与纵向分化过程，这是保证一个组织有效率的必要前提。亨利·明茨伯格提出的组织架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五个基本构成部分：技术核心、高层管理、中层管理、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可见层级与管理系统是组织必不可少的运行保障。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是去“化”而不是去“行政”，并不是把大学组织从国家与社会的等级序列中剔除，或者将大学内部的机构设置取消行政的称谓与等级那么简单，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此大学的行政化可以理解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彻底异化为行政机构，去行政化的目的在于把异化为行政机构的大学彻底地回归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这就必须要把泛化的大学行政权力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像伯顿·克拉克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在大学层次帮助管理者确定他们的情境，和在系统层次明确管理的定义。”让每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知道和理解大学行政的真正意义，确立服务于学术的大学行政理念，并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已成为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现实要求。

二、外儒内道：大学发展的现实策略

在对大学行政化的讨伐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行政化的主要根源，是大学的不自觉、世俗化造成了大学向权力的献媚与屈服。事实上，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外。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一个企业都讲行政级别的社会现实中，大学“被行政化”或更准确地说大学“被政府化”是情理之中的。不管大学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行政化”是大学当下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实策略，单纯指责大学一方是有失公允的。大学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的大学之中，但其根源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在社会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现实土壤之中，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及现实基础。去行政化有赖于中国行政体制的整体改革，远不是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单纯依赖大学的努力与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是不能奏效的，这将是一个渐进的、系统的、长期的过程。

那么，在当下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是不是就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有理想的大学从来都肩负着对社会的引领责任，大学通过自身行政化的去除以推动或加快社会行政体制的变革同样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大学责任。现实的挑战与路径的选择都在考量着大学的智慧。笔者认为，医治传统与历史弊病的良药同样只能从传统与历史的精华与智慧中去寻求。中

国大学的问题只能用中国式的智慧来解决，把抽象的大学理念放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也许更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 外儒内道与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大学的科学发展在于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从大学的外在价值来看，大学要适应与引领社会的发展，从大学的内在价值来看，大学应提升教育与学术创新的能力。如何实现大学价值的内外统一，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思想——外儒内道是大学应对行政化策略的一剂良方，是大学发展的现实策略与追求的境界。

外儒内道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也是我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从根本上说，对我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二者构成了我国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色，道家思想则以自然、超脱为特色。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协调补充，可以说，“儒道互补”与我国思想史的发展相始终。“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天下为己任，以功业为目标；另一方面又受道家哲学熏染，适时地采取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用儒家思想进取，用道家思想调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变动不居的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

这种处世哲学对现代大学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大学而言，外儒强调的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外在价值，内道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与内在价值。大学首先要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这是生存的前提。儒家哲学思想以“和”为最高境界，崇尚“和为贵”，“家”与“国”是儒家的重要范畴，孔子也不反对“有国有家”者组成的等级结构，他肯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审美。前者是国，后者为家，也许在人类可以达到的视阈内，社会总是存在毋庸置疑的等级制关系，大学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社会结构而遗世独立，大学必须保持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还曾经改变了它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大学必须保持适度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以引领社会发展。如果大学脱离社会现实，与世隔绝，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大学一味迎合社会，过分世俗化，就会失去面向未来的品格。

(二) 儒家的刚健有为与大学的适应与引领

儒家是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参与现实政治，担当社会责任。大学再也不可能回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时代，现代大学发展的动力恰恰来源于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学必须适应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满足国家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毫无疑问首先是要适应，包括文化、制度、理念等，但仅有适应是不够的，儒家还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大学应在适应中适度地超前并引领社会，“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所需要的（Needs）”。

文化视野中的大学是一个具有民主价值的机构，在去大学外部行政化的过程中，大学能做的就是通过对未来公民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的教育与培养，从而建立社会的民主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民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教育的文化传授必然要弘扬民主意识，为社会输送具有民主自觉的先进成员。因此，必须以社会共同利益为目标，用民主的价值来改造教育，用民主的思想来支配整个大学教育制度，以此来稳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消除“官本位”的影响，建立有限政府，回归大学的学术性、主体性。

（三）道家的返朴归真与大学的行政理念

大学学术性、主体性的回归，大学有必要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中坚守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遵循道家提倡的返朴归真，高蹈远引，追寻大学的精神与学术的自由，顺应科学的规律与真理的秉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道家熏陶出了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批判者，增强了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学需要有这样的境界并主动提升承担起这种责任的能力。

相对于外儒而言，内道要求的是大学的发展要合乎大学的逻辑，有理想的追求与对现实的超越，不断提升大学内在的知识价值与学术能力。什么是道，按照著名作家王蒙的看法是“‘道’就是‘到底’，也就是‘究竟’”，“老子这个‘道’就是来动员我们的智慧与思维，让我们进入‘究竟’与‘到底’，即进入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的”。据此，大学之道的命题也即演化为大学“究竟”与“到底”是什么的命题，对大学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作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

笔者认为，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理论上缺少对大学“究竟”与“到底”的追问，而在于在大学内部行政运作中缺乏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约束、衡量的原则，大学内部的去行政化主要解决一个大学行政的“究竟”与“到底”的问题，即大学行政应遵循怎样的“道”来行使权力，也即大学行政的“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是什么。在大学，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其通过科研得以创造，通过学术工作得以保存、提炼和完善，通过教学和服务得以传播。毫无疑问，行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大学行政职能的发挥都必须以人才培养与学术进步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保障大学职能的发挥和大学理念的实现。因此，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应是大学行政的“终极关怀、终极期待、终极追寻”，是大学行政的理念，是大学行政的价值所在。

（四）学术、学者、学科：大学之本位

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的大学行政理念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在大学的行政活动实践中怎样加以

贯彻呢？笔者认为，大学行政这一理念的体现与贯彻主要集中表现在大学行政过程中如何对待学术、对待学者、对待学科这三者的态度上。

首先，不仅仅大学的学者们需要确立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大学价值观，而且要让大学行政人员们同样牢固树立这种观念，使之成为他们从事行政活动的文化信念，并在实践中作为准则加以奉行。大学行政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制度文化的建设，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始终将学术进步作为出发点，强化学术信念，尊重学术权力，淡化行政利益，正确定位行政在大学终极价值实现中的从属地位，将有利于大学学术事业的推进。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从事大学学术活动的主体——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从根本上讲，大学的声誉来源于它的学术声誉，而学术声誉是由其作为学者的教师和所培养的学生所作出的科学贡献来决定的，绝不是大学中的其他什么人，这应该是容易理解的事实，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就任校长的上任伊始就指出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一切活动声誉取决于教授。因此，贯彻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的大学行政理念，就要求大学行政系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以造就大师、造就名教授为己任。制度中的利益取向必须向学者们倾斜，对行政系统工作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通过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状况来考虑和判断，要摒弃大学干部队伍、师资队伍和职工队伍建设在同一层次上一起抓的平均主义管理理念。不可否认，仅有学者、教师对大学组织的构成和运作是不够的，支持大学组织系统的运行还需要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他们是大学组织系统这一有机体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一支更强的师资队伍，推动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末不能倒置，大学的终极目标不能淹没在大学组织的其他子系统的技术目标之中。

为了促进学术进步，实现学术价值，必须重视将学者们联系和凝聚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学科。学科是学者们赖以存在并更好地体现学术价值的组织形式，在大学系统内，是学科承担了大学的三大职能，它是表现大学本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因此，学科是大学的细胞，要给予学科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在大学治理中的合法性参与。

大学的儒道会通，内外融通必须有一个实现的机制，笔者认为就是遵照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建立起大学治理的内外部结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制定大学章程，章程是所有大学利益相关者的一个共同约定，在这个章程里，政府和学校都是独立的法人，都是主体，都要遵守这个章程，这样大学办学有了一个“防火墙”、“护身符”，避免了政府对学校无限的干预和权力扩张，以此来实现大学的主体性。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了这种“入世而又出世”的精神，“它就

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外儒内道、儒道互补的大学策略让大学“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在适应社会中引领社会，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在纷繁的世界中醉心于学术。使大学既入世又不失去大学的特质，既有治平之志与现实精神又不失超旷适足之学术襟怀，在投身社会的同时，保存一片属于知识的天空与泛舟学海、穷理尽性的大学理想。外儒是内道的实现与表达，内道是外儒的基础与依据，外儒内道的大学发展策略、其最终旨趣在于在现实的形态上会呈现出由儒家尊崇，却由道家首创的“内圣外王”的大学气象。

教育研究 2010 年第 6 期

大学“去行政化”难在哪里？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康 健

老百姓都知道，温家宝总理有很深厚的教育情结，情结背后有深思熟虑的教育理念。他担任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对行政体制改革当有很全面的思考。他如此明确地提出教育体制中行政化倾向的问题，是十分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教育体制的行政化倾向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有着长期发展过程的老问题。它也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问题，而是曾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问题。特别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一直是被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阿什比、克拉克、波伊尔等世界高等教育大家都曾对这个问题发表过高论。

当世界进入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以来，集权控制高等教育的范式，如法国范式，已经受到挑战。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集权的模式逐渐让位于分权的和重心下移的教育管理模式。从参与管理决策的角度审视，不仅仅大学教授的参与权一直被极端关注，普通教师的参与决策权、学生的参与决策权，都已经被世界各国大学广泛重视乃至被接受。高等教育的行政权力、拨款权力、学术权力三大主要权力逐渐被分割，体现出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进程。然而，如何在此三者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又不失去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的传统精神、理念和职能，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校是“平衡器”吗？还是利益攸关的一级？

可以预见，教育的去行政化不会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简单。直到 20 世纪末，这个过程仍然在朝着一个逆向的过程发展，即决策权力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上移。由于行政化倾向的扩大，教育内

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校变成行政化的执行机构。有明确的事例证明，学校行政化的倾向比以前更严重了，“官僚人员增多了，教育行政当局的管辖权扩大了，行政管理的层次也有所增加，这在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都是如此。各种官僚化的规定多得数不胜数，行政管理人员趋向更专门化，分配和监督的工作也更专业化。官僚机构似乎变得更有权力，行事也更独断”也就是说，行政化的影响由外而内，逐渐成为积重难返的顽疾。

二

根据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当国家特别希望在战略发展过程中对教育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由于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不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与改革的历史，可能作出过度的、越位的行政干预行为，把好心的愿望变成了越俎代庖的指挥，从而挫伤了学校的独立性和自尊心。他们把学校本生于基层的、分散的、原发的自主创新精神变成了“命题作文”式的、“就范”的规划研究，使大学逐渐失去了有利于自主高深学问研究与高级人才成长的原生态、自然、朴素的学术氛围，颠倒了大学行政管理与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关系。久而久之，大学总是等待国家的规划课题指南，学者也渐渐失去了做独立选题研究的习惯，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独立鉴别的能力，由此，他们也离自主、原创的研究与成果越来越远，像被填食喂大的“鸭子”。

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如果不参与这些带有相当强烈的计划性和有行政化级别的规划课题和项目，不仅个人的职称、学衔的升迁会受到伤害，甚至连大学教授起码的生活尊严都会受到挑战。如果不积极认同各级行政化的和指令性的计划指导，大学、学院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因为，大学的研究经费主要是通过政府渠道获得的。于是，我们看到，大学内部追逐功利目的行为从隐形变为显性，从难以启齿到公开索求和追逐。学者中希望从政、希望有行政级别的人越来越多，想靠行政和学术两条腿走路比一心靠做学问走路的人越来越多了。学者用领导讲话和官方文件的观点做学术研究的论据越来越多了。大学的良知和独立见解越来越少了。行政化转变成了学者良知的“腐蚀剂”。

由此看来，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发生、发展并成为顽疾不是偶然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学常常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于是，计划性的行政干预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就可以乘机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它们确实可以克服大学发展中的某些问题。著名的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说，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效率、纪律、平衡、计划、导向等都是行政化的优势。更具体点说，首先，通过国家政策和资源的分配迅速实现国家的重点目标；其次，行政性的干预可以更好地实现计划经济状态下的资源和力量的重组；再次，可以充分显示国家对教育发展方向和质量的引领。虽然，有时这种国家行为的作用是必要的，但它终究不能取

代大学学术研究的原发性。

就其根本而言，这种高度行政化行为的危害在于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会伤害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和学科平等的三大基本原则。大学的学术自由是自下而上的，而行政性的管理和干预是自上而下的。当行政权、拨款权、学术权被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有行政权力的人就可能捷足先登，使学术自由和教育民主的法则被动摇，使广大普通学者的科研积极性受到不公平的伤害。殊不知，大学创新力的基础存在于大学教授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研究之中，任何学术成果都是在长期的冷板凳上“坐”出来的，是在意外的灵感和百折不回的试误中得来的。不是吗，诺贝尔得主都不知道他们啥时候会得奖，他们啥时候将去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感言，是耳顺之年，还是耄耋之年。所以，仔细琢磨一下，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精神被我看做北大的“原精神”）首先是说给教授们听的，不是为了制定什么政策。总之，任何真正的学问和创新都不能靠行政命令、不可能通过计划去实现。

这些年来，国家和地方级别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科研规划越来越成为大学和所有学术机构获得科研课题的来源和主要的科研行为。其实，科研周期与规划课题的周期本来就是不对称、不同步的。在这种制度之下，为了做就范的课题、应景的文章，申报课题挂名的多，论文成果突击完成的多，闭门造车的多，不联系实际的多，重复性的多，已经成为学术界越来越严重的不良倾向。一方面，国家规划的课题申请规则在形式上是自愿的，而且不是以行政面孔出现的，甚至把行政领导的长官意志也已经转化、至少“装饰”成了科学的研究性的课题名称；另一方面，它在评审级别上和经费上的诱惑力也让广大学者都不得不普遍接受。

根据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经费的分配常常是使行政化加快、加大的重要原因。经费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足以制衡所有的研究导向、研究重点乃至学校工作方向。国家重大项目在高校的全覆盖，占据了学校独立研究和大量的教学时间、空间，大学教授们都忙着做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和委托研究，忙着把课题变成论文。与此同时，教授们在教学上的时间、与学生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制度的危害是使大学失去了专业与学术的独立性，使教授们失去了自己的本功。不为过地说，这不啻为一种变相的剥夺。这些年来，被权威化、等级化的项目，变成全体大学竞相争夺资源的战场，在申报关键时期，大学纷纷派出游说精英去打通关节。因为，一旦成为什么什么重点项目的学校，不但地位大增，经费有保障，连招生都会得到好处。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钱是花了不少，精力也着实消耗了不少，大学的科研诚信、教学质量却一再亮起红灯。长此以往，必将败坏大学的风气，进而伤害大学的元气。

二战以后，学校的规模呈现超快、超大、超常规的发展。巨型学校，甚至超巨型的学校首先在

发达国家出现。学校教育成果的机械化、标准化、市场化和商品化生产方式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确实使得更多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与此同时，高度行政化的集权管理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得高等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受到伤害。于是，高等教育领域就产生了一种观点：大学太大了必生官僚主义。更准确地说，超大的大学可能造成对教育本质和规律的伤害。不是吗，当学校的规模超过其合理的规模效应之阈的时候，就不得不依靠高强度的行政化手段来管理。大学、中小学都是如此。当一所中小学、一所院系的师生都互不相识，一切管理都要靠见物不见人的手段进行的时候，师生关系必然疏远了，教育最基本的精神就要变异了。美国过世的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波伊尔非常坚信这一点。

2010年在北京参加大学校长国际论坛的英国大学校长向我们传递了他们十分坚定的教育主张：英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在学院，学院的基础在HOUSE，整个英国大学的活力和创新力在ONE BY ONE的师生关系之中。他们甚言之：大学可以牺牲大楼，牺牲许多硬件条件，但决不可以失去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他们说，小的学院制、导师制的教育教学方式虽然成本很高，但是，英国大学的历任校长没有人能废止，也没有人愿意废止。美国大学校长的主张则与英国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中国的大学受到美国影响太深了，听到他们的主张似乎更容易接受，他们给中国大学的建议也带有更强烈的主观色彩。

中国的教育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近三十年来，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出现，诸多被行政控制的部门解放了，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工作效力。但是，大学具有“遗传的惰性”（阿什比语），却似乎宁肯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难怪有人曾给上层领导写信说，大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后、最顽固的一个堡垒。美国兰德（RAND）公司把大学这种偏于保守的性质叫做“机能性障碍”。

如果每一个规律可以预见固然很好，但是意外常常成为规律中最核心的规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其实是很滞后的，又因为我国底子薄，教育经费不足，特别是大学长期受到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影响，我们对于大学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进程是有心理准备的，那就是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但是，当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需要加大投入的时候，高等教育却得到意外的青睐，甚至使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比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实现的速度还要快。近些年，超越常规的大学合并、扩招和所谓的综合化，各地大学根据指示分别采取了运动式的或以地域划片、或以学科整合、或以学段升级为理由的大兼并；继而又通过合并后的扩招政策，让大学一下就膨胀起来了、轻浮起来了，且重心持续高升。本来重心应在专科教育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却在短短几年就炒作到了以硕士、博士培养为重点的研究型大学的时代。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现代化在一夜

之间就实现了，尽快实现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标语遍地开花、声音不绝于耳，其胆量令人咋舌。

我以为，现代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是靠毛入学率的数字来实现的。现在，许多的高等教育研究都把大众化当做一个大前提对待，其实，高等教育大众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进程远不像通过扩招而实现大众化毛入学率数字标准那样简单。大众化时代本应出现的许多的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比如，教育重心的下移（社区教育地位的提高）、教育发展中心的分散（地方化），甚至对升学追求的降温、对文凭学历追求的降温等。此外，与市场经济、国际化经济相伴而出现的多元化的影响力使得教育体制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行政权力，还有立法、拨款、市场的影响，还有学术评估与教学质量评估标准的影响，还有地方势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的影响，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大学体制改革的难度。

本来是带有很强计划和行政色彩的大发展，必然使那些一下膨胀起来的、爆发起来的学校出现了内部强化行政管理的倾向，必然刺激它们不断提升行政级别的欲望。行政化的管理常常是主观的、非专业的。各国的教育行政化倾向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直接的行政化、通过使学者行政化、通过层级行政化。不论何种的行政化都只能控制工作过程，不能控制结果；只能控制形式，不可控制内涵。学校和学术机构对科研人员强制出勤打卡，定量考核发表文章，并以字数为标准，都是这种行政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试想，这些学校或者学术单位对教授和研究人员还有什么吸引力，他们研究、创新的积极性还剩多少？与此同时，另一个客观规律也在悄然发挥效应——官僚主义之下必生机会主义。繁琐的规章制度、文牍主义、应景文章、欺骗作假等行为此起彼伏。

三

毫无疑问，大学的转型是在必然之中。大学教育的转型核心问题是体制的改革。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正在把未来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放在体制改革上。1985年后，我国就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但是在改革的外围走了二十多年了，对某些核心问题的改革仍然步履维艰。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好多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前提是解放思想。

去行政化不是改革的目的，其关键是尊重教育规律，使大学回归本真。克拉克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在德国、意大利、英国这些学者独立性较强的国度，官僚主义对大学内部渗透速度较慢，但是，在美国就很快，并在学者和专职行政人员之间发生对立。

大学本质是什么？现代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会发生什么变化？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高等教育的管理受什么规律支配？什么专业背景的人适合做大学校长？高深学问怎么产生？高级人才怎么培养？大学靠什么面对社会责任（良知）？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世界和中国的高等教育界。

坚守社会良知，尊重教育规律始终是大学精神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人。促进人的成长、发展和社会化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大学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的规律，尊重教育教学的规律，尊重大学发展的规律。学校的一切资源，包括历史和现实的资源，包括大楼和大师，包括科研和文化，包括一切现代化的资源与手段，对于任何一所大学而言，都在转化成教育效益的时候，即转化成促进学生发展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这也是大学与研究机构或其他机构的本质区别。因为，大学是学校，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我认为，这个“教育转化”（这里我没有敢用“教化”这个概念）率才是评价大学质量的核心标准。

大学应该反思，在我们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到底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在学生身上？在课堂上？在精心指导学生的论文和实验上？重心下移，是去行政化的方向，方向的目标是更多地关注学生。剑桥大学的前任校长说，大学期望出人才，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要求学生怎样，而是看我们（大学自身）怎样。换言之，大学和大学的老师究竟做了什么，做得怎样将决定结果。

行政化倾向问题的实质是淡化甚至否定学校以人文性和教育专业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用行政管理的经验和规律取代教育的经验和规律。例如，教育从来是重过程的，而教育的过程又从来是丰富多彩、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学校活力与创造力的生成就来自日日新的教学过程，来自师生之间朴素、自然、随机的交流、对话，来自师生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学习，而不是来自计划性的大兵团作战。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者朴行。行政化的规律被滥用于学校和教育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例如关于绩效工资的问题。在行政事业单位成功的工资改革平移到学校工资改革的时候就可能不符合学校教育的规律。

总之，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大学回归本真，焕发教育的活力，促进学生的成长。阿什比倾其毕生的经验得出结论：如果对大学管得过多，组织机构太死，在大学中过于讲求等级的高下，那么大学在社会变化影响它的各种职能时，便不能作出和谐性的反应。大学的前途，就其协调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而很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者校长。

四

时至今日，体制上的行政化与内部机制上的行政化哪一个更可怕？

如果大学去了行政化、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那么大学是否做好了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机制、自己的动力来推动大学的现代化进程？我以为，因为学校被行政化太久了，学校已经相当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即便政策上发生迅速转变，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如同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在金笼玉盆的环境下禁闭多年，还会自由飞翔吗？说不定还会留恋当初养尊处优的生活呢！20世纪，瑞典在推进大学U68改革的时候，起初大学上下是一

片支持声、赞扬声。但是当改革触及大学内部诸多利益群体的时候，反对声则甚嚣尘上，很多行政官员、还有相当一部分大教授、高级讲师亦在其中。所以，大学内部的改革将是体制改革更艰难的过程。

可以这样设想，体制改革将以去行政化的外部体制改革为出发点，而以学校内部体制、制度和机制的改革作为归宿。这项改革的起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寻找到归宿将更难。与瑞典和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一样，大学可以积极推进最终将深刻触及自己利益的改革吗？美国的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大学》中说：“毫无疑问，在大学中，肯定会有抵制变革的，他们会为现状辩护，支持大学传统的使命和价值观，反对（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把大学转变成不恰当形式的一切举动。这些大学根本没有预见到，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维持现状的危险系数要远远大于冒险革新。”

改革常常是从观念的更新开始，但是进入内部的制度改革的时候才会真正触及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大学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结论和模式。目前国内关于去行政化的呼声似乎很高、很一致，但是我们毕竟对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没有太多系统的理论思考和长期的实践过程，哪怕是学校和地方局部的改革实验。改革更没有进入深水区，没有触及官本位的教育行政体制，更没有经历改革失败的考验。行政化造成的划一的学校管理体制也就造就了没有创新活力的学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官员担任了大学或者各级学校的校长，担任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一方面，这种政策实际上加快了我国教育行政化的速度；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大学校长到底是一个什么专业性质岗位，是学术性质的岗位、行政管理性质的岗位还是教育的岗位？抑或是一种复合性质的岗位？是否可以外行领导内行？面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太多的学习和思考，需要更多的改革与实践。

毫无疑问，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的良知。但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人们还是担心学校在各种利益腐蚀和复杂关系影响下的自律问题，担心在去行政化的进程中大学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受到关注和尊重的时候，当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在学校发展、管理、领导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受到尊重的时候，又由谁来监督大学的良知和自律？

总之，三十年改革开放告诉我们一条基本的结论：改革是唯一出路，开放是唯一的选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经强调说，一切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生都是在积极应对变化和挑战中诞生的。去行政化、克服官僚主义化的教育改革是相当困难的。克拉克说，这将是重大的、突变的改革。对美国近二十年有相当影响力的教育部部长助理拉维奇，在1997年跟约瑟夫·P·维特利特合著的《新世纪，新学校》中，曾经强烈地表达了她对传统教育体制的不满，并极力支持

特许学校的发展。她说：“将特许学校和签约管理学校引入公共教育，一定会推动学生和学校学业水平的提高。”不过经过了十几年的改革，拉维奇却来了个 180 度的转变，就在今年的三月，她说特许学校已经成为传统公立学校的潜在威胁，它们已经偏离作为教育改革孵化器的初衷。虽然这是一个发生在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例子，但道理是相通的。由此看来，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可能会有反复的过程。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一切重大的改革面前，我们必须保持独立的审慎的思考，不可以轻易跟随或照搬他国的经验。

辜鸿铭老爷子当年在学校讲课时一直拖着长长的辫子，一些学生就嘲笑辜鸿铭：“都什么时代了，你还留着辫子？”辜鸿铭老爷子这个“怪才”反唇相讥道：是啊，我头上的辫子大家都看到了，可是，有的人的辫子却在心里，别人看不见啊！现在，当人们一致讨伐“行政化”的时候，多少有点像阿 Q 的“革命”。可是，“去行政化”背后隐藏的问题和困难我们还难以发现，当它的改革触及诸多利益群体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更不得而知。

必须指出，去行政化不是不需要行政管理，不是要否定管理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因为，大学被行政化以后，伤害了大学的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违背了大学的教育教学规律。行政化有点像套在大学脚上的桎梏，一旦大学获得解放，就将重新焕发出良知和活力。我们相信，到那时，大学将从每一个课堂上、每一个实验室里、每一个宿舍中，在每一个师生俯读仰思之余暇，在校园文化天地之上下，生出一流的希望。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 年第 3 期

★一流大学★

想念洪堡

——柏林大学创立 200 周年纪念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王洪才

我一直想说，想念洪堡，想念洪堡对现代大学创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有了洪堡，才有了德国大学模式，才有了德国大学的振兴，才有了日后崛起的德国。这一切都与洪堡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长一职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有关，虽然只有短短 18 个月的时间，但其所留下的财富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我们今天纪念洪堡，是为了纪念他对柏林大学创建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同时也纪念现代大学制度创立 200 周年。因此，这一纪念对于当前我国探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言别具意味。

—

一提到洪堡，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他提出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主张。这是一条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原理，没有这条原理，就很难出现今天的研究型大学，也难以出现今天如此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甚至很难说大学能够走进今日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自然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事业。可以说，“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主张开辟了大学发展的新纪元，大学结束了过去只注重复述经典的历史，开始了创造文明的历史。

洪堡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思想不是简单地提出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知识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因为他所追求的知识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是昔日哲学家们所共同追求的真理，如同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最终实体。这些正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或哲学家一直试图去揭示的世界奥秘，因为在这些思想家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认为真正世界是统一的，而不是分散的、分离的。这显然是一种哲学主张，是他们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思考。这一思考，是古今中外真正学者对于世界真正存在的本底的思考，也是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没有这一思考，世界的景象就无法构架。

洪堡对世界命运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关心使他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不是简单地从古典经书中寻找答案，而是希望在科学探讨中寻找答案。换言之，在他的下意识中，

如果经典中存在了既定的答案，则世界不可能仍然处于现在的无知状态，世界之所以如此这般状态就是因为仍然没有认识到世界的本质，那么就必须继续探讨。这个探讨就必须面对客观的世界，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关于世界的最先进的理念付诸实践验证。进而言之，就是要把理想世界变成现实世界。这一工作显然是异常艰巨的，学者必须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有对人类命运负责的精神才能承担这一重任。洪堡的思想得到了当时的学者的呼应，如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等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他们都对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新解释和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如费希特提出了自我哲学的主张，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解释学主张。这种对世界本真的探求态度与洪堡的人文主义主张是内在一致的，这也是他所主张的探求真正的科学，而非如正在兴起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完全采取分离和分析方式探求冷冰冰的物质世界，因此他们不认同那种对有感情存在的理智世界采用对没有情感存在的物质世界所运用的认识方式。

这股人文主义风潮在德国民族复兴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洪堡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大学的设计上。在他对大学的新架构中，哲学再也不是神学的侍女了，哲学开始成为智慧之树上的明珠，代表了知识的最高成就。各门学科探讨均是在哲学的指导下进行。换言之，各门具体学科的探讨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建立在一定哲学思想指导的基础上，没有这一指导，分科探讨就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各门学科知识均应是哲学知识的具体化，各学科的探讨都是对哲学假设的验证。两者之间具有分化和统一的关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各门学科孤零零存在就没有真正价值，只有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的世界时才有真正价值。这种思想显然与正在兴起的功利主义思潮是不一致的。在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各门学科满足自己采取实验手段所进行的细小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又在改变和控制物质世界过程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洪堡显然认为这种行为是短期的、短视的，是破坏了世界的整体形象，所以建议对世界的探讨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也即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避免对世界盲目探索从而为人类招徕无穷的祸患。他的主张无疑是充满睿智而又富有远见的。

二

出于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洪堡建议在大学建设中把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在洪堡看来，教学活动不能脱离对科学的具体探讨过程，否则教学就变成了空洞的教条传输，这样就束缚了人的潜能，而不是对人类智慧潜能的尊重。教学活动的本质就是引导学生去认识真正的世界，这一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探索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教条接受过程。这意味着，学生也只有在从事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认识到真正的世界。当然，这种科学的研究是包含教师的参与和引导的，教师的参与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的激励和行为上的指导，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认识的效果。这些主张与

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的大学改革主张是一致的，二人日后的执掌柏林大学校印。

显然，师生的共同探讨不可能是一对一的，而应该是一对多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教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建立共同探讨背景或氛围的问题。如果是一对一的探讨环境，就会变成教师对学生的主导，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传统的灌输习惯，因为无论如何学生在知识方面和智力发展程度方面都无法与教师相比；如果变成了一对多的关系，学生在知识和智力方面就可能与教师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学生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运用他们的智慧对世界的本质进行多方面的猜测。在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中，教师需要分散精力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这个过程就分解了教师对自己既定观念的坚持，就必须在质疑面前重新建构知识，这样学生知识探求兴趣得到了满足，教师的知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教学形式就是今天大学广泛采用的研讨班形式，这一教学形式可谓是德国大学的发明。

为了确保教师不对学生形成主宰和专制，柏林大学提出了教学自由原则。教学自由首先是学习自由，即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学习内容，换言之，一切学习应该建立在自己的主动性发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性接受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学生就有了学习的自主权，其直接的含义是学生求学不是为了接受教化，而是为了发现和证明自己的潜力，其证明的途径就是通过满足自己的探求兴趣来实现，而这正是学习自由的精髓。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教师的学术探求活动，教师不再固定地捆绑于一定的课程和知识，而是可以自由地探索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并引导学生一起进行探索，这就是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的结合。这一原则成为德国大学研究水平提升的法宝。所以我们说，教学和研究的结合是建立在学习自由和研究自由的基础上的，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体现。

为了实践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洪堡在柏林大学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学术自由具体就是指教学和研究自由。而学术自由的实现不仅要避免教会的干预，而且要避免国家的干预，为此就要求国家对大学发展持长远的眼光，而不是指望从大学的当前活动中获得直接的好处。这意味着国家要大力支持大学，并且要尊重大学的学术自由。对这一原则的坚持是德国大学模式能够成为世界大学效仿榜样的重要基础。

上述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洪堡对人的自由探索天性的尊重基础上的。如果不尊重人的求知兴趣，不尊重人的自由天性，他就不可能提出教学自由原则，也就无法发展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因而，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内在一致的，都是洪堡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

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及学术自由原则如今已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定律。洪堡在此基础上开始构建他的大学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教授位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地位，这就是德国大学所创

造的大学教授的讲座制。作为讲座教授，教师有权安排自己的助手，有权安排自己的课程和研究计划，有权决定低级别教师的晋升，当然也有权决定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说，教授拥有大学活动的基本决定权。在教授讲座制基础上建立大学教授会组织，教授会对学术的总体事务拥有决定权。讲座相当于今天的各个学科的教研室单位，各个学科以学院的形式组成自己的学术活动单位，由正教授作为主体组成的教授会进行治理，学院院长负责组织教授会活动并执行教授会的决议。当学院院长与教授会的意见相左时，院长可以否决教授会的意见并请教授会另议。如果仍旧存在冲突，则提请上一级的教授会裁定。这一模式后来成为美国大学教授会运行的基本图式，也是今天德国大学学术治理的基本原型。一般而言，学院院长都非常尊重教授会的决定，一般不充当发难人的角色。因为德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以学术为中心的，教授会拥有学术决定权，行政组织是服务性的。此外，学院院长也是经过选举由教授轮流出任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行政岗位，没有多少实质性权力，其职责是进行协调和平衡。这就是大学重基座组织的缘由。

在这个组织架构中，大学校长是荣誉性质的，由主要教授选举产生，往往是学术高度的标志。大学校长往往不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而主要作为大学的形象代表。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常务副校长、校长办公室或校长秘书等，但这些人员或者机构也主要是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而不负责学术事务，学术事务由大学教授会决定。大学教授会则是由各学科的讲座教授代表组成。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中，大学不负责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大学资源的分配和管理由大学法来规定，各行政组织负责执行。在遇到特殊问题时则由大学教授会进行商议决定，从而不会出现大学行政专权的现象。

德国大学是由国家主办的，大学教授也是由国家聘任的，这就使得国家在保证大学教授学术自由的同时又能实现教授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德国所采用的国家考试制度，使大学生的学习自由与国家意志相一致。这一制度使德国大学在德意志民族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政府控制大学埋下了伏笔。一旦政府出现非理智的行为，大学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教授的学术自由将不复存在，这一点是洪堡无论如何都不愿见到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事例就是，20世纪上半叶纳粹掌权后大批有才华的学者受到迫害，被迫逃离德国，从而导致德国大学的衰落。

四

实事求是地说，德国大学的组织架构只能在分权体制下运行，如果高等教育采取中央集权的形式就无法执行。同时，良好的法治传统也是这种大学组织架构得以运转的基础，大学的功能角色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此外，从文化氛围讲，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尊重知识的传统，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学术自由，当然也就不可能赋予教授以学术自主权。德国之所以能够实行这种大学组织架构，与德国浓厚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关，与德国文化中浪漫主义的精神有关，与德国

战败的耻辱有关，当然也与一大批卓越的学者的坚持有关。在此我们不得不说，洪堡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人格魅力、学识修养以及组织能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特殊性，德国大学模式就只能成为德国大学的模式，而无法成为世界通用的大学模式。所以，国际学者在羡慕德国大学模式之余，若试图将这一模式移植到自己国家，就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转变。最著名的则是美国大学在对德国大学模式进行移植后所进行的改造。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吉尔曼校长试图按照德国大学模式建立自己的研究生院，但在本土的压力下不得不建立本科生学院，这就是后来的霍普金斯大学。而这之前吉尔曼试图运用德国大学模式来建设加州大学，结果完全无法走通。其他美国学者试图摆脱传统的从殖民地时期沿袭下来的英国大学模式，把德国大学模式移植到美国去，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如新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德国大学的影响也促进了传统的殖民地学院的改造，最显著的标志是许多大学都建立研究生院，哈佛大学就是其中一例。这些大学虽然成就了自身的卓越地位，但并非是适合美国本土需要的。真正适合美国本土需要的则是新建的州立学院即后来的州立大学，它们是应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而生，代表了美国大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从而成为美国大学模式的原型。这些学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德国大学模式的特点和传统英国大学模式的优点，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美国大学模式，后者成为 20 世纪中叶之后主导世界大学发展的模式。美国大学模式的崛起，是世界学术重心转移的标志，也成就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从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本土对德国大学模式的吸收和抗拒。许多殖民地学院是宗教性质非常浓厚的，谈不上什么学术自由，更谈不上教授治学。正因为缺乏学术自由，才诞生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组织，美国大学教授们通过争取终身制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地位。即使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州立大学也是如此，这些学校的行政色彩更加浓厚。加州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直到后期惠勒、斯普鲁尔校长执政时仍然是校长主导的大学。可以说，直到今天，行政主导一直是美国大学的特色。虽然美国大学逐渐实现了学术与行政的分离，构建了董事会、教授会和校长的分权治理结构，但仍不是德国大学模式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所以，通过回顾德国大学模式在美国的嬗变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德国大学模式的真正含义，就能够明白没有完全通用的大学模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洪堡所确立的学习自由原则在美国大学已经开花结果，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哈佛大学所推行的选修制。这不仅是学术自由思想的体现，更是学习权利的体现。这一点也是教育成功的规律。

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确立：理性的凯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阎凤桥

1810 年，柏林大学宣告成立，至今恰好是 200 周年。我们纪念柏林大学的诞辰，不是将其视为一所普通的大学，而是将其作为近代大学的典范。德国历史学家拉甫说：“通过洪堡的改革，高等学校获得了基本上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形式和内容。他建立的柏林大学成了德国大学的范例。”我们不禁要问，柏林大学为什么会出现 19 世纪初的欧洲？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必然状况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想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柏林大学虽然诞生于德国，但它却是欧洲社会发展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

一、柏林大学的建立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

柏林大学建立于欧洲启蒙运动过程中，启蒙思想奠定了柏林大学办学的思想基础。因此，回顾柏林大学的发展历史，不能忽视启蒙运动这个社会背景。下面，笔者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启蒙运动以及之前的欧洲文明进程，然后再回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德国大学改革和柏林大学的建立。

17-18 世纪出现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欧洲文明进步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欧洲诸国正在从封建国家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启蒙运动既延续了早先的文明，又架起了与现代文明之间联系的桥梁。启蒙运动发端于 17 世纪早期以英国为中心的科学革命。

发生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集中表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虽然启蒙运动在德国没有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有声势，但是也有德国自己的特点。那么，什么是启蒙呢？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美国学者汉金斯对这个时代的特征做了一个简要而生动的说明：“任何一个相信人具有利用其理性改正以往错误的人，都会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价值。”因此，启蒙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神权和君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鼓励人们运用理智，对包括宗教和世俗的一切事物进行理性的评判。

启蒙运动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中心，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启蒙取向，但彼此相互依存和交融，形成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三种遍及欧洲的进步思潮。启蒙运动并不是偶

然出现的，它是欧洲几百年文明进步的延续，在它之前出现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实质是一场人本主义运动，人文主义得以复兴，理性得以回归，科学思维方式得以确立。尤其是在 1563—1763 年的两个世纪中，发生了一次最伟大的思想革命，欧洲已不再不加区别地继承希腊和罗马的遗产，而是通过独立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来审视被继承的学说。17 世纪中期之后，欧洲出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认识论范式。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笛卡儿，他主张怀疑是科学活动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就是理性思想的集中体现。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培根，他认为实验是获取新知识的最好途径。德国启蒙运动从 18 世纪末的耶拿和柏林开始，逐步形成了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哲学为代表。

我们可以说，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理性主义包括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维护人的尊严的精神。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认为：“人的终极目标是和谐均衡地培育其独立于束缚他的头脑的目的而发展的所有力量。”启蒙运动的目标，与重视教育的手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启蒙运动中，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学也不例外。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德国在 18 世纪进行过两次大学改革运动。在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中，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埃朗根大学得以创立。与过去真理是既定的、不需要去发现的思路不同，新大学将真理看作是可以被人探索发现的，教学就是让学生掌握这种能力。托马西乌斯和沃尔弗是德国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同时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奠基人。托马西乌斯使哲学脱离了神学，成为大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沃尔弗创立了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体系，取代了经院哲学在大学中占据的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学中，法学和神学教育也接受了理性的观念，理性被作为处理所有问题的思想指南。新的教育指导思想和办学形式，使得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成为中欧地区的学术中心。18 世纪后期，德国进行了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是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的继续，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新的大学理念，改革教学实践活动。两次大学改革运动，是德国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两次大学改革运动为柏林大学的创办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另外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了当时尚处于落后封建社会的德国。德国对于法国推翻君主制的大革命运动感到欢欣鼓舞，并且想依靠法国军队来推翻德国封建统治。随着德国被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意志民族丧失了独立性。德国面临着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双重使命。在德国反封建和争取独立过程中，政治家施泰因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施泰因从 1807 年开始对普鲁士进行全面的改革，成立柏林大学是改革计划的一个部分。

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洪堡在受命创办柏林大学时，创造性地将启蒙思想应用于教育实践活动。在柏林大学创办之际，启蒙思想在教育哲学方面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它强调教育的实用功能；第二种是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个人发展其潜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物质上相对贫乏、政治上缺少统一的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比其他欧洲民族更热衷于寻找一个“精神世界”。于是，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德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应地，“精神”也成为洪堡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他看来，人类最理想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自主的发展，一种普遍、自由而完美的人类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虽然柏林大学与洪堡的名字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洪堡的办学思想深受同时代其他欧洲思想家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参与柏林大学创建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可以说，柏林大学不仅是洪堡的创造，更是启蒙时代的产物。

二、柏林大学的创办体现了理性思想

柏林大学成立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晚期。启蒙运动的核心——理性思想，对于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洪堡的办学思想概括起来讲，包括教学自由、教学与研究统一、科学统一性等。洪堡办学思想的形成，与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在德国第一次大学改革进行过程中，洪堡正好在刚建立不久的哥廷根大学上学，他亲身体验了什么是新型教育，并对这种新型教育形式给予高度的评价。洪堡提出，只有在哲学和艺术两个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一个民族才真正称得上完美。在卢梭等思想家的影响下，洪堡从启蒙运动和理想主义原则出发，提出教育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他认为，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纯粹科学，以实现主观教养的目的，孤独和自由是实现主观教养的前提条件，教育和研究相结合是基本原则，通过哲学统合具体和个别的学科是有效途径。在他看来，评判人性完美有六个标准：充分的自由性；适度的规律性；生动的想象力；高超的思辨能力；独特的个性；完整的民族性。如何在国家与教育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呢？他认为，教育必须独立于政治，国家不应该强行干预教育，而是要为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洪堡本人就对法国大革命可能带来的新专制持有高度的警觉，在他看来，如果国家采取将一个好东西强加给所有人的方法，那么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

洪堡的办学思想，既是欧洲普适理性思想的反映，也是德国社会特殊性的反映。洪堡既反对将高等教育完全纳入国家和工业发展轨道的法国实用主义，也反对仅注重个体道德修养的英国古典自由教育。与英国和法国的教育思想不同，他把追求纯粹知识作为举办柏林大学的最高形式。可以说，洪堡是将“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

洪堡有关创办柏林大学的设想和计划，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更得到了学者的支持。一时间，柏林大学汇集了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等一批优秀学者，从而为后来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哲学家费希特担任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他把科学反思提高到所有课程之上，成为大学教育活动的核心。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 1815-1816 年间担任柏林大学的校长。他在 1808 年《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一文中，阐述了其大学观，包括大学独立于国家、哲学是大学的核心、思想自由等重要思想。除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之外，歌德、席勒、康德等其他德国启蒙思想家的言行，对于洪堡的办学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中，一般的学科结构是文学院（或称艺学院）属于初级学院，在它的上面有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柏林大学改变了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学科结构，将哲学院置于最高位置，为后来各门具体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变成现代社会的核心学科奠定了组织基础。事实上，柏林大学的哲学部发展成为师资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和地位最高的学部，是大学科学的研究的中心。发生在哲学部内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对于其他学部的思维和发展形式也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提升哲学的地位，是理性思想在柏林大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最直接的反映。

三、柏林大学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制度性因素

汉金斯说：“一旦认识到并应用了适当的科学方法，人类知识的稳步扩展以及条件的稳步改善就会是必然的结果。”18 世纪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置于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组织就必然会繁荣，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核心社会制度，因为这些活动也可以在其他机构中进行。确实，这一时期在有些欧洲国家，大学组织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活力。而德国的情况则不同，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成为欧洲学术活动的中心。那么，现代大学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德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呢？

德国大学的繁荣，与德国社会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误区。下面列举几个事例，说明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欧洲大学所面临的危机。英国的科学革命主要不是发生在大学中；法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用实用性的技术学院取而代之；德国一些激进的改革者也提出要废除大学。由于大学教学内容保守，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以及其他原因，许多欧洲国家大学的规模长期停滞在较低的水平，甚至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柏林大学是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的呢？

自由是大学活力的源泉。18 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使得自由思想能够深入到大学的各个方面，而其他欧洲大学则做得没有那样彻底。另外，是否能够吸引到优秀学者，也是关乎大学发展命运的关键所在。在法国和英国，重要的思想家游离于大学之外，制约了大学的

发展；而在德国，沃尔弗和康德等思想家则一直在大学开展学术活动，造成德国大学在社会思想方面占据领导地位。于是，18世纪末，德国大学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步的动力机构。

柏林大学并非仅因其思想先进性，而主要是因其表现而取得成功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一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出来，即在新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是如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优秀成果的呢？德国是如何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呢？社会学家本-戴维对于上述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研究发现，在哲学思想和高等教育理念方面，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有所区别。英法两国选择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观，而德国则接受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哲学倾向。德国主要关心个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学问和知识本身就是追求的目的。在高等教育领域，与英法不同，德国采取了非功利主义和非经验主义的做法。事实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反而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戴维认为，自由、竞争和正在发展的大学系统，是主要原因。他对欧洲的三个领先国家做了如下比较：在英国，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才能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只能当作业余活动对待；在法国，通过特定考试的青年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德国，经过科学训练和完成学术论文的人，才有资格从事科学研究。不难看出，与英、法相比，德国在科学人才选拔制度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大学的实验室逐步变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到19世纪末，一些教授的实验室已经享誉世界，如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家冯特和生理学家路德维希的实验室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世界上相关领域杰出的科学家都在他们的实验室工作过。德国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并不在19世纪早期改革计划预料之中。这些非计划的活动，对于确立德国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产生了更大的作用。德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开始时，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注重远离社会实际的历史研究，韦伯的研究工作就属于这种形式，但是在自由和竞争环境作用下，后来的研究发展却超越了这个限制，出现了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学术体系，如马克思的研究工作。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德国学术体制也不例外。德国所崇尚的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对立，使得德国大学不许医学教授行医，应用科学和技术学科在大学中没有适当的位置。政府一方面扮演着为大学提供资源和保护学术自由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构成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威胁。最糟糕的是，对于人性的偏面理解，以及国家过强的操纵权，导致了20世纪法西斯政权对于人类文明的肆意摧残和践踏。

四、小结

欧洲启蒙运动推动世界步入现代社会，也开创了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明史就是自由和理性进步的历史，欧洲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走过了这一历程，从此带来了科学、

技术、哲学、艺术、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进步。高等教育史专家珀金写道：“法国大革命暂时取消了大学，但是为以后法国甚至欧洲大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不但造就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也造就了一批伟大的学术机构。柏林大学就是这批学术机构中的杰出代表。柏林大学的成功，既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也与德国社会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没有欧洲启蒙运动对人性的解放、对于理性的推崇，则不会有柏林大学；如果没有德国对自由探索纯粹知识的崇尚以及若干有利于大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现代大学模式则不会从德国诞生。自由和理性既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也是造就现代大学成功的关键所在。美国学者胡弗认为，以自由和中立为特征的西方大学制度，是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在纪念柏林大学诞辰 200 周年之际，我们再一次为 200 年前由自由和理性带来的成功而欢呼，同时也为今天德国大学失去夕日辉煌的处境而悲哀。20 世纪德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这是两个国家在制度理性方面较量的结果。人类社会为认识和追求理性，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探索和奋斗。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摆脱了神权的束缚，但是自由和理性可能还会遭遇到来自世俗（包括政府、市场和大学自身）的侵蚀，需要我们保持警醒并采取应对措施。

复旦教育论坛 2010 年第 8 卷第 6 期

洪堡 2010，何去何从

上海师范大学 俞 可

一、两个现状问题

2010 年 10 月 10 日，柏林洪堡大学跨越了整整两个世纪。一周之后，18 日，在洪堡大学新任校长就职仪式上，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教与科学部部长身份转任的扬-亨德利克·奥尔伯兹 (Jan-Hendrik Olbertz) 阐述了学校所期待他成就的系列使命。其中以两项为重：在第三轮“卓越计划”中跨入精英大学行列；解决博洛尼亚进程所引发的问题，并推动高校教学改革。“卓越计划”与“博洛尼亚”是对 2010 年德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恰当概括。

（一）卓越计划

德国联邦政府已运作了两轮“卓越计划”(2005/06, 2006/07)，分别有 9 个“未来方案”，39 个“博士生培养基地”和 37 个“卓越跨学科集群”入围，“未来方案”获得批准的学校通常被誉为“精英大学”。

第三轮（2012—2017）遴选于 2010 年春天启动，到截止日（9 月 1 日），有 65 所高校递交了共 227 项申请，两年后揭榜。获胜者共同分配 272 亿欧元，其中 31 所学校争逐“精英大学”桂冠。

按照巴登-符腾堡州科学部部长彼得·弗兰肯贝尔格（Peter Frankenberg）的判断，“卓越计划”不可能无止尽展开，此番可能是最后一轮。于是，与前两轮失之交臂的高校纷纷摩拳擦掌，务求必胜。洪堡大学便是其中典型之一。

洪堡大学在上一轮败给其兄弟——柏林自由大学，全校哗然，学界愕然。于是，时任校长克里斯多夫·马克希斯（Christoph Marksches）及时宣布不再竞聘下任校长职位。分析人士坚信，有奥尔伯兹横跨政界与学界的经历，洪堡大学稳操胜券。

前两轮因彻底忽视教学而广遭学界诟病。2007 年 8 月 20 日，德国高校联合会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震动了德国高教领域，德国全国高校在 1995—2005 十年期间总共削减了 1451 名教授，减幅为 6.3%，而期间学生总量未减，反而增长了半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为德国高校教学窘状打响了警报，而“卓越计划”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学家理查德·明希（Richard Münch）为排挤效应出现而担忧，即科研将聚集于几所特权高校，“卓越计划”使德国科研体系“置于卡特尔、垄断与寡头政治的阴影下”，从而导致德国高校体系分化为研究型大学和囿于标准化本科教学的教学型高校。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联盟理事长、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芭芭拉·凯姆（Barbara Kehm）。而第三轮“卓越计划”将为 2017 年成型的德国高等教育新版图定下基调。其遴选与前两轮不同之处在于，在“未来方案”中高校应该阐述其改善研究性教学的意愿与方式。

（二）博洛尼亚

2009 年 4 月，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 46 国教育部部长决定，博洛尼亚进程完成期限向后推迟 5 年。2010 年 3 月 11—12 日，欧洲 46 国教育部长在博洛尼亚十周年庆典上通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旨在为未来十年设定行动日程。之前，欧洲大学校长联合会出台的《趋势报告 2010：欧洲高等教育变革十年》显示，学制统一率已高达 95%，对本科和硕士专业课程运用欧洲学分累加体系与转换体系的普及率分别达到 88% 与 90%。然而，该联合会 821 所成员高校，认为博洛尼亚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的仅为 58%，38% 的高校却持观望态度。这印证了由欧盟委员会 2008-2010 期间资助的两份评估报告《高等教育改革在欧洲的进展：博洛尼亚进程》和《高等教育改革在欧洲的进展：治理改革》的结果，即博洛尼亚进程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并没有深入到院校层面，所期待的高教改革如高校自治与高校体制的效能提升之间缺乏显著性关联，反而导致大学信息系统官僚化地管理着学习的每个节段，持续评估成为不堪忍受的负荷。而且，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效应也仅停留在形式化层面，如学制转换、欧洲学分引入，一旦涉及课程与教学，便遭遇到各国现有的学术传统与

大学文化。欧洲物理学会 2008 年考察了 24 个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的 152 个物理本科专业，这是首次在全欧洲范围内对博洛尼亚进程在某个特定学科产生的影响展开调查，其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

这场“把教育彻底纳入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之中的试验”关涉“高等教育的标准化与模块化”，并指向“传授能够经受市场考验的工作才能”。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联盟创会会长乌尔里希·泰希勒尔 (Ulrich Teichler) 认为博洛尼亚进程所强调的“就业能力”凸显功利主义。在德国，高等教育的相关群体如校长、教授、大学生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不应仅仅为劳动力市场输送后备力量而放逐人的塑造与才的培养。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称之为“德国大学的麦克唐纳化”。教育的所有要素：“意志性自决、智力性活动，揣测性思考，预知性想象”一并消弭，学生成为“条件反射式的学习机器，作为个性发展创造性部分的教育被忽视，人被改造成为分数猎手。”学生没有任何时间奉献社会、政治和家庭。德国大学生后勤机构联合会声称，学生群体中已大规模出现失败恐惧症、倦怠以及对心理咨询的需求。心力交瘁或过劳症，这类通常在职员尤其是与人频繁接触的服务性行业的职员身上显露出来的心理疾病，正在青年学子之间迅速蔓延。2007 年，德国全国共有 66000 名大学生寻求心理咨询与治疗，一年后，人数增长了 20%。失眠、焦虑乃至胃痉挛成为学生中常见的症状。联邦教科部委托康斯坦兹大学展开的第十次“大学学习现状与大学生人生取向”调查显示，尽管八成大学生对博洛尼亚进程持积极态度，但是，本科学习普遍被认为是一项冷漠、紧张而又无趣的活动。每 4 名学生中就有 1 名可能随时中断学业。46% 的学生表示，对博洛尼亚进程所推行的模块化课程的理解存在很大困难。学生终日疲于应对考试与积攒学分。据联邦统计署 2010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27% 的大学生中断学业，尤其是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在工程科学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德国高教信息中心 2010 年年初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2000 年即博洛尼亚进程刚启动之际，大学生学业中断的首要因素是职业意向转换 (19%)，而 2008 年，这个缘由退居到第六位，首要因素则变成学业压力以及考试失利 (31%)。物理学家乌尔里希·朔尔沃克 (Ulrich Schollw o ek) 认为，博洛尼亚进程设计者把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规则建立在一个“扭曲的人学观”上，把大学生退化为“功能性人”。2009 年 12 月份，维尔茨堡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内斯·柯尼希斯豪森 (Johannes K o nigshausen) 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博洛尼亚进程危及宪法所保障的学习自由。

同时，本科教学“占据了大部分教学比重，这意味着高校教师在大众面前的地位严重受损”。大学教授“失去他们昔日的专业认同与威望，以最为粗糙的方式被修剪着，一味条件反射式地去完成规定参数”。2009 年年初，美因兹大学神学教授马里乌斯·赖斯尔 (Marius Reiser) 因抗议博洛尼亚进程把大学异化为“学习工厂”而愤然辞职，虽为极端案例，却是问题冰山之一角。同年，作为德国大学教授行会的德国高校联合会出版《博洛尼亚黑皮书》，以此方式来纪念博洛尼亚进程十周年。

当年年底，该会呼吁全体成员即德国高校教授调换 12 月 10 日的所有课程，以便全力声援大学生示威活动。这是全德范围内针对博洛尼亚进程发动的声势最为浩大的学潮。在洪堡大学门前，抗议学生拉出巨大横幅：“100%出勤，7%学习，0%反思”。博洛尼亚进程遂成为“洪堡的梦魇”。“博洛尼娅进程失败了。其结果显现为新一轮教育危机，即教育不是为所有人！博洛尼娅进程把两次世界大战未能得逞的德国大学摧毁了。”有学者竟然惊呼：“德国大学死了”！

当欧洲大学校长联合会成员高校被问及，在质量保障改革、筹资改革、治理改革、欧洲科研与创新政策、博洛尼娅进程以及国际化等因素中，哪种会对本国高校今后五年发展产生首要影响，只有 7 个参与国选择了博洛尼娅进程，占 47 个成员国的 15%。德国的选项是质量保障，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正是高校教学。

二、一个洪堡理念

1809 年 2 月，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作为其教育改革蓝图的皇冠，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改革理念的影响下，洪堡设计了一所“典范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使大学生能够接受全面的人文主义熏陶以及在各个主要学科展开研究性学习，大学不再是中小学的延伸，而是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师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学术而共处”。1809 年 8 月 16 日，国王威廉三世采纳洪堡方案，决定创建柏林大学。当年 12 月 1 日，洪堡向国王递交“文化与公共教学司报告”。翌年 10 月 10 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后人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和“现代之原型”。洪堡在短短 16 个月的司长任期上所留下有关大学的只言片语遂成为德国模式的理念源泉。其核心要素为三点：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教育机构的特性；民族觉醒。

（一）告别洪堡

尽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并非洪堡的表述而是后人的总结，但在德国高校教职员中间的认可度相当高。根据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项针对德国西部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88% 的人认同教学加科研，对教学和科研的偏爱却分别是 29% 和 59%。可见，教学始终未能与科研并驾齐驱，所以，洪堡大学教授、教育史学家海因茨-埃尔玛·泰诺特（Heinz-Elmar Tenorth）称洪堡理念为“神话”，长期被“滥用”，作为“象征传统的棍棒”来捍卫某些群体的利益。据他估算，15% 的德国大学教授生产 80% 的科研成果，约三分之一的教授自聘任后无所事事。曾被奉为科研与教学完美结晶的讲座制教授成为懒散的温床，缺乏创造力或根本没有工作欲望的教授并非个别现象，且渐渐成为顽症，洪堡对大学组织所期待的“自由不可或缺，寂寞大有裨益”被肆意扭曲。2007 年，两位教

授出版《“恶行”教授：高校幕后的懒散》一书，对上述现象给予无情揭露。这些在集权制权力关系下产生的讲座制教授[35]以教学自由与学术自由为依傍，合法性地抵御包括行政与司法在内的各种介入或干预，每个教授事实上打造着各自的“专业小诸侯国”。其实，讲座制教授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新鲜事物，早在洪堡当年便显现出来。1882 出任普鲁士宗教、教学与医学事务部大学司司长的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Theodor Althoff）试图以铁腕来根治此弊端，却落得一个“德国高等教育的俾斯麦”诨号。这种行政高压下的大学体制被称作为“阿尔特霍夫体制”。1911 年 10 月 12 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第四届德国高校教师大会上对“阿尔特霍夫体制”予以猛烈抨击。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学术史学会前任会长吕迪格尔·冯·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从该事件预测到“告别洪堡”的时代已至。

如果说，上述事件揭示的是学术自由与学术放任的两难问题，那么，学术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博弈是柏林大学长久的心病。

在洪堡大学主楼第二层的洪堡纪念铜牌上篆刻着洪堡名言：“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并可永无止境去求索之物”，此句出自其《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一文。然而，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当初所期待的以“哲学头脑”来替换“面包学生”，在柏林大学建校初期便只是一个梦想。当初，教育的非功利性与以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冉冉上升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用性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早在 1818 年，时任柏林大学校长菲利普·康拉德·马莱纳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批判了学生学习的“功利取向”，认为他们把精力消耗在学习那些“未来实践生涯必备的东西”。而此时已作为旁观者的洪堡对柏林大学现状亦忧心忡忡。

大学教育的学校化，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外部掌握替代内部自治。这三大异化从柏林大学建校伊始便腐蚀着洪堡理念的实质。在不少德国学者眼中，洪堡理念仅为“乌托邦”或“神话”而已。

当然，18 世纪的那些视大学为输送“国家臣仆之学校”的观念仍根深蒂固。柏林大学建校时设立的四大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论资排辈，并没有借鉴施莱尔马赫的设想以哲学院来领衔，更没有传承康德“系科之争”所倡导的学术之纯粹性、自由性、自主性。可见，柏林大学虽为新设却无创新。而思想根植在新人文主义与德国自由主义土壤的洪堡，其所倡导的大学为国家服务但远离政府的观点，在封建集权主义的普鲁士遭遇抵触。更何况，1807 年普鲁士惨败在拿破仑铁蹄下，民族屈辱使全国上下热盼国家复兴而非个体觉醒，从而一方面直接导致洪堡理念未能在实践层面得以贯彻，另一方面注定了柏林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尤其是 1810 年 3 月 31 日的内阁指令彻底“摧毁了（洪堡）作为部门主管的作用”，于是，上任仅 16 个月的洪堡在柏

林大学开学前四个月便毅然辞职。

所谓大学的德国模式即通常所说的洪堡模式是在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竞争中形成，而非在柏林，更没有某种既定的模板即洪堡理念。其实，柏林大学的历史性声誉更多的是来自于它作为 19 世纪一系列新兴学科的诞生地。而凝聚洪堡理念的 10 页文字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只是一份未完成稿且未注明写作时间，更何况，这份手稿是历史学家布鲁诺·格布哈特 (Bruno Gebhardt) 1903 年受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委托整理洪堡的政治文献时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份迟到的文稿为后世对柏林大学的成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资源。

（二）拯救洪堡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把洪堡理念视作柏林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的观念基础，一种高远的规范体系和理想”，其“具体的落实过程，即制度化的过程很可能永远达不到所高悬的观念的高度，但这也是这种观念的魅力所在；它为大学及其成员提供了极富吸引力、值得争取逼近的目标，并提供了通向这一目标的行为规范体系，因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力”。

事实上，现今的德国大学尤其是在“卓越计划”与“博洛尼亚”的双重变革之境遇下——两者均为抢占人力资源制高点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被动应对，以经济利益为指向——与洪堡的“高远的规范体系和理想”渐行渐远。然而，洪堡理念仍魂牵梦绕着学界与政界，但所提供的并非“行为规范体系”，而是“强大的社会动力”。也就是说，面对现实虽然无奈却必须有所作为，至于作为是否符合“行为规范体系”则另当别论。

2007 年年初，国家科学委员会提出设置教学教授 (Lecturer) 的建议，教学教授占全体教授五分之一，并必须把三分之二的精力投入教学。这份建议刚出笼便遭到各方抨击与抵制。教学与科研相分离会直接导致科研的非学术性扩张，以及基础研究的衰弱。这个建议至今未能成为现实。

2007 年，洪堡基金会主席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 (Wolfgang Frühwald) 在其新作《我们需要多少知识？》中预测未来的高校必然走向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尽管他本人作为日耳曼文学教授是人文科学的坚定捍卫者。他思考的出发点主要是，洪堡式大学难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

也是在 2007 年，柏林市政府计划整合柏林四所大学和四家科研院所，以此打造一所名为“柏林研究大学”的科研航空母舰。此设想一旦实现，可谓德国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痴迷所激发的科研中心主义的生动体现，更是德国高校研究与教学相分离的最佳注脚。但一年后，“柏林研究大学”设想破产。柏林自由大学因入围第二轮“卓越计划”而对此设想不屑一顾，是一个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此设想试图把科研彻底从大学中剥离，“柏林研究大学”将承担所有尖端科研，而高校主要承担教学。对大学而言，无疑是焚林而田，竭泽而渔。正是这位设计师——柏林文教部部长尤尔根·措

尔纳 (E.Jürgen Zöllner)，以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为“高校教学卓越计划”摇旗呐喊。该计划是由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与德国私人基金会联合会于 2007 年联合倡议，以 1000 万欧元来推动高校教学建设。每个获奖项目最高可获得 100 万欧元的奖金，奖金则由德国私人基金会联合会与该项目申报的联邦州各承担一半。2009 年遴选出 6 所大学和 4 所应用技术大学申报的项目。几乎同步，黑森州政府于 2007 年联合企业基金会赫尔提 (Hertie) 共同发起“教学卓越奖”，当年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各一位和三位表彰奖、三位个别奖。2008 年开始每年评选一、二、三等奖各一位和一位个人奖、一位辅导员奖。奖金总额每年为 37.5 万欧元，黑森州政府和赫尔提基金会承担比率为 2:1。而莱法州教科部早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就分别推出“莱法州教学奖”和“莱法州学与教卓越竞赛”，在每年的教学节上授奖。前者针对个人，每年授予 8 位大学教师和 4 位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文理科各半；后者针对机构，分为项目奖、教学成就奖和战略方案奖，项目奖和教学成就奖是颁授给院系的奖项，战略方案奖赐予学校领导层，而且，此项奖项只对那些参与申报“高校教学卓越计划”的学校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莱法州教科部部长恰恰是现任柏林文教部部长措尔纳——“高校教学卓越计划”的鼓手。

作为“高校教学卓越计划”与“柏林研究大学”的设计师，措尔纳似乎成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表率。其实，措尔纳两项计划的弦外之音是，教学与科研可各行其道。这在德国极具典型意义，即在洪堡理念的大旗下割离教学与科研。

德国高校联合会 2009 年年会以“大学——科研的中心？”为主题，旗帜鲜明地反对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在科研上，大学应该与科研院所合作，但不可被其所取代。2010 年 6 月 10 日，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达成“教学质量协议”，在今后十年间共同投资 20 亿欧元用于改善高校教学质量。但是，2010 年 10 月 25 日，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却使在联邦层面设置高校教学研究院的方案搁浅，尽管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竭力主张。

在柏林大学成立 200 周年的前夜，泰诺特接受了电台采访，话题仍然离不开教学与科研，尤其是面临着科研院所与大学相抗衡的紧迫局势。泰诺特认为，“科研之所以需要大学，因为……科研不可能在一代人中间完成与终结其工作程序，……因为科研的胜任力与工作方式需要传授给下一代，因为只有大学才能通过考试使科研后备力量获取质量保障。”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或者更恰当地说，教学与科研相对峙，从柏林大学创立之日一直拉锯了整整 200 年。于是，洪堡情节挥之不去。

三、无尽魂牵梦绕

洪堡大学 2009 年 10 月 12 日启动持续长达 15 个月的 200 周年校庆活动，其收官之作是题为“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学未来”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 年 10 月 7-9 日在该校召开，但不面向公众。

原定在会议落幕之际以《洪堡备忘录 2010》为校庆画上圆满甚或惊艳句号，却因与会者的分歧而无限期地延期发布。

《洪堡备忘录 2010》草案由七大准则组成：(1)基于科研的教学与从教学获取灵感的科研是大学之核心；(2)大学自治保障科研自由；(3)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取决于所有学科的团结；(4)教学与科研之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被视作大学第三项核心使命；(5)研究型大学必须使创新性的科研项目不为功利所役；(6)大学应该作为保存与呵护记忆的场所，否则学术无以进步；(7)为跨学科事业，大学应该与校外机构展开合作。草案最后说道：“我们相信，这七个准则为思考明日之大学提供坚实基础。这并非意味着对所珍爱的传统之生存加以保护，但作为对沿着洪堡所荐并被证实为相当成功的道路锲而不舍地重塑大学的一种贡献。”

“太保守”、“太谨慎”、“来自象牙塔”，甚至对德国高等教育存有“危险性”，这显然是一些情感化批判。具体说来，争议集中在以下几点：大学有没有必要涵纳所有学科；“研究型大学”的表述有无亲美倾向；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仅为单行道；可否把终身学习列为第八条；该备忘录是为洪堡大学而撰写还是为全球所有大学。

与会代表期待着修订稿，也好奇地盼望着一周后就职仪式上新任校长奥尔伯兹的就职演说。然而，奥尔伯兹除了罗列所需承担的使命，尤其是“卓越计划”与“博洛尼亚”，还重申洪堡大学 200 年前的建校理念直到今天一直在为必要的改革提供一定的路径，这些路径是启蒙式的，是学术性的。“要告别的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一种准则。洪堡对我们来说不是项目而是标杆。”

至于洪堡能否成为标杆，且回首百年校庆。

1910 年柏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日后成为德国 20 世纪教育学巨擘的爱德华·施普朗格 (Eduard Spranger) 把对柏林大学建立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篇论著结集为《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特芬斯论大学之本质》一书出版，并配以长篇引论。其中并没有洪堡的篇目，尽管之前一年，他在柏林大学以 500 多页著作《威廉·冯·洪堡与人文理念》获取教授资格。这或许是对后人的警示：柏林大学 200 年校庆，不言洪堡理念只谈大学本质。

2006 年秋天，联合国高等教育研究与知识论坛在巴黎召开主题为“作为研究与知识创新的大学：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科研对于大学的身份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科研也是优秀教学的必要条件。这显然是对作为大学本质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国际共识，人们也愿意追思洪堡的丰功伟绩。

至于洪堡理念曾经是否真正成为现代大学的模板，学界仍争持不下。问题关键之所在却是，洪堡理念能否合乎时宜，即 200 年前的那份遗产能否指引今天甚或明天的大学。

洪堡理念诞生在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怀的年代，而当今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世界主义情怀。要是把国际政治视作内政，那么，相应的大学应该是世界公民主义的学校。于是，贝克对 19 世纪的第一代洪堡模式和 21 世纪的第二代洪堡模式加以区分，前者是民族主义教育，大学孕育出民族主权与民族国家，后者则基于相互依存的全球性原则。“21 世纪的所有大学旨在磨砺对他者的思考，但并非源自启蒙式的理想主义，而是源自世界经济的现实主义。”以第二代洪堡模式来架构的大学应该既塑造时代精英又推动教育大众化。此外，贝克还强调，在尊重“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把以第二代洪堡模式来架构的大学分化为以教学为主和以科研为主。由此便产生疑惑，第二代洪堡模式还有无必要以洪堡来命名。况且，洪堡在赋予文科中学和大学的使命便是培养自主的个体和世界的公民，“自主的个体”与“世界的公民”于是被后世归结为洪堡教育理念的两大支柱性概念。世界公民是“尽可能多地把世界幻化为自己的个性”，以臻达到生活之至高意义。那么，第一代洪堡模式与第二代洪堡模式岂非如出一辙？

200 年以来，洪堡被赋予时代的愿景与个人的期许，经久不衰，乃至于本真的洪堡早已湮没于史海，这到底是洪堡之大幸还是不幸？

再度回眸百年校庆。

1910 年 10 月 11 日，柏林大学建校百年大庆的第二天，以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隆重举行，1911 年 1 月 11 日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议。相当一部分科研实力尤其是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精英从大学撤离，汇聚到促进会旗下的学术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人力，并从教学义务中彻底解放出来，完全投入科研攻坚。该协会首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所倡导的“作为自主的社会系统的学术”公然与大学分庭抗礼，由此宣告洪堡模式的彻底终结。

历史的吊诡在于，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是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补充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700 年 7 月 11 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决意设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泛学科的科学院，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设计的方案上签字。而恰恰这家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因 1812 年 1 月 24 日新章程的颁布而名存实亡，其旗下的科研机构逐渐并入新创立的柏林大学。此事件背后的推手正是洪堡兄弟，以便成全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可见，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的成立，对于柏林大学，无疑是釜底抽薪。自此以后，柏林大学与洪堡理念从同床异梦走向分道扬镳，1949 年改名为洪堡大学也无力回天。或许就是因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未能在柏林大学显现实效性，科研才重新自立门户，遂成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没有洪堡的柏林大学懵懵懂懂踉踉跄跄了 200 年，洪堡 2010 何去何从？

